

学人聚合与中国学界“自组织”：

以 1940 年代《思想与时代》学社为中心

何方昱

【摘要】探究《思想与时代》学社的聚合过程，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界“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从内部自发联合到自觉拓展延续的有序过程，而且能展现学人在战时中国谋求思想建设和拓展学术影响的种种路径，同时揭橥中国思想界的多重面相。本文“从内部视角”（from within）进入，通过史实的重建和辨析，“再现”这一学社的聚合过程。浙江大学、密切的私谊网络及共同的学术旨趣为《思想与时代》学社的聚合和延续奠定了基础，进而，学社通过创办刊物、编译西哲名著、学术邀访、出版丛刊以及谋求团聚等方式进一步拓展了其学术空间。种种努力使《思想与时代》学社成为 1940 年代中国学界一个联谊密切和颇有影响的学人群体。

【关键词】《思想与时代》学社；一九四〇年代，中国学界；自组织

【中国图书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何方昱，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235

《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在战时及战后中国维系 8 年之久，共出版 53 期，刊发学术论文、书评、纪念文字和学术通讯 363 篇，为刊物撰稿的作者达 114 位，其中，服务于学术界者 107 位，而又以浙江大学（47.8%）、中央大学（12.4%）、专业研究所（8.0%）、武汉大学（7.0%）、西南联大（5.3%）为主，乃 1940 年代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人刊物。^①这一刊物虽得到政府资助，然实非“外界的特定干预”之结果，关键还在于刊物实际上由一学社负责。^②

学界以往有关 1940 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研究，关注焦点多为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复杂纠葛，研究对象则多为倾向激进的大学教授抑或自由知识分子。陈仪深依据“个人与权力中心的距离”，把 1940 年代的自由主义分为“个人谏诤”、“组党介入”、“公共论坛”等三种类型，分别以胡适、张君勱、储安平代表之，而当时中国的暴力与革命以及政治无序化则是自由知识分子遭遇挫败的根结所在。^③在对储安平及其《观察》群体所作的个案研究中，汪荣祖也认为，“储安平英勇的奋争却以个人的灾难而告终。在革命的中国，这或许就是自由主义悲惨命运的缩影。”^④胡素珊（Susan Pepper）则高度评价储安平创办的《观察》“成功地保持了它作为一份不受任何党派控制，自由发表政治言论的独立性刊物的形象”^⑤，但也承认它的成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一个谜。由此可见，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彼时政治密切相关。除自由知识分子之外，激进的大学教授亦是学者关注的焦点。马紫梅（Mary G. Mazur）以吴晗 1940 年代在统一战线及民主同盟的活动为主线，追寻吴氏参加政治活动并反对国民党政

^① 1940 年代除《思想与时代》月刊外，另有一些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刊物创刊。1940 年 12 月，唐君毅等人创办的《理想与文化》创刊；1947 年 1 月，牟宗三与姚汉源在南京创办《历史与文化》杂志，1947 年 5 月，徐复观创办《学原》杂志，宣扬中国文化；1948 年，熊十力弟子程兆熊接纳牟宗三的建议，在江西铅山鹅湖创办鹅湖书院与《理想历史文化》杂志。然而这些刊物维系时间都较短，《理想与文化》共出 8 期，《历史与文化》办了 3 期，《理想历史文化》仅 2 期，《学原》最长不过一年半，与《思想与时代》月刊于 1941—1948 年共出版 53 期形成鲜明对比。

^② 关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创刊源起与经过，请参阅拙稿：《学人、媒介与国家：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为中心》，《史林》2007 年第 1 期。

^③ 陈仪深：《国共斗争下的自由主义（194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3 期（下），1994 年 6 月，第 266 页。

^④ Yound-Tsu Wong, “The Fate of Liberalism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hu Anping and His Circle, 1946-1950”, *Modern China*, Vol. 19, No. 4 (Oct., 1993), p. 488.

^⑤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8 页。

府的原由,探究其政治行为的本质,凸显了学者吴晗的另种政治气质。^①有学者进而指出,大陆地区在近十年来有关抗战时期文化史研究中仍太过偏重中共部分,尤其是对彼时中国文人的研究上,“被锁定的对象大部分是所谓‘进步’的知识分子,即立场‘倾共’者。”^②然而,新近的几项研究已开始注意到与此不同的视角,论者更多地关注国民党与知识界的亲疏关系。王晴佳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对教授与学潮之间的关系做了较深入的探讨,“不但注意那些与学生接近的‘激进’教授的作为,也注意他们的‘对立面’,亦即那些接近政府、反对学潮的人士的言行。”^③王奇生亦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兼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党务,探讨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活动情形,“进一步考察战时知识界/教育界与执政党不同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④。桑兵则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如何通过争取有影响力的学人,巩固和扩张其在故都(北平)的势力作了深入研究。^⑤

毋庸置疑,以上诸项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身处1940年代的关键时代,国共两党与知识界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但既存的这些研究,更多地是从学术与政治的视域考察1940年代的中国学界,而于读书人自行组织的学社鲜有深究。或许一般认为,在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大片国土沦陷,大部分社团的活动或停顿、或终止。^⑥事实上,在战时及战后,仍有一些学人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开展学术活动,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就其本身而言,这一学社颇有作为学界“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意涵。^⑦本文即以《思想与时代》学社为中心,试图“从内部视角”(from within)进入,通过史实的重建和辨析,“再现”这一学社的聚合过程及其学术空间的拓展,检视这一学人群“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⑧的种种抱负。

一 浙江大学与学社场域的初步形成

1936年5月18日,竺可桢在杭州的浙江大学行宣誓典礼,正式执掌浙大。此项任命由陈布雷提名并经蒋介石面谈后认肯,自此直至1949年,竺可桢主校达14年。^⑨事实上,早在竺可桢正式接手浙大之前,已开始为浙大物色优秀师资,作为其学生的张其昀与陈训慈均为首选人物。1936年3月10日,竺氏在日记中云:“为浙大事复晓峰及叔谅函,告以已与布雷接洽,允赴浙大半年,在此半年期内物色继任人物,并邀晓峰赴浙讲学。浙大无地理教授与无历史教授,故对于史地非增人不可。晓峰前谓可请叔谅作秘书,余恐其体力或不能兼顾,如使脱离图书馆则又非办法也。”^⑩

张其昀与陈训慈在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一事中,甚为积极,建议老师接受任命,一方面

^① Mary G. Mazur, “Intellectual Activism in China during the 1940s: Wu Han in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Democratic League”, *China Quarterly*, No.133 (Mar., 1993), pp. 27-55.

^② 冯启宏:《战争与文化:近十年抗战时期文化史的研究回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3期,2006年9月,第198页。

^③ 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8页。

^④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6页。

^⑤ 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2007年第1期(总第24期),第108页。

^⑥ 方庆秋等:《民国党派社团出版史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⑦ 协同学创始人哈肯给“自组织”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制约,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这里的‘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和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系统的,而且外界是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系统的”。自组织最先被用来概括自然界物质现象活动的特质,后来也被广泛的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参见H·哈肯:《信息与自组织》,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⑧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二版。

^⑨ 关于竺氏担任浙大校长一职之经过,除《竺可桢全集》第6卷·日记中有较详细之记述,陈训慈亦有较详实的论述,可参见陈训慈:《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收入《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1页。

^⑩ 《竺可桢全集》第6卷·日记,1936年3月10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固是出于师生情谊，另一方面则因几人均均为浙人之故，正如陈训慈在给竺可桢的信中所言：“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①，而浙江大学正肩负着如此责任与重担。在得到竺可桢的邀请时，张其昀本已有出国进修的打算，却因之放弃，^②因张氏亦有振兴浙东学术的志愿，遂追随竺氏加入浙江大学，出任史地系主任，成为竺氏的左膀右臂。与此同时，张其昀还力劝南高同学缪凤林同来史地系任教，并推荐郭斌龢出任文学系系主任。竺可桢作为一校之长，不仅主张教授治校，更广纳贤才，将浙大各院系院长、系主任团结在一起，在困顿年代努力营造了一个既宽松又严谨的学术氛围。尽管《思想与时代》月刊及学社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而非浙大，然因有竺氏带来的良好氛围与人脉关系，仍为刊物的创办及学社的延续创造了客观条件。^③竺氏所领导的浙大，无疑已成为《思想与时代》学社多数同人安身立命之所。

然《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创刊及学社的成立，则要等到张荫麟与张其昀会合浙江大学时方才实现。二张早在 1926 年就已缔结文字之交，1933 年张荫麟自美国写信给张其昀，表示自己的志向仍在史学，并有编纂国史丛书的志愿。1940 年初，张荫麟因清华待遇及家庭变故等原因，接受了浙大之邀，二张终于会合。翌年 4 月，张其昀和张荫麟在遵义的浙江大学有一席纵谈至深夜，二人商定：“拟纠合同志，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④是年 8 月《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号出版，《思想与时代》学社亦由此衍生。

无论在战时的遵义，抑或战后的杭州，《思想与时代》月刊编辑部始终伴随浙江大学文学院的迁徙而择定，或正因此，学社的核心社员在相当程度上亦依托浙大而确定。^⑤学社核心社员共有 7 位：张其昀、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钱穆、贺麟、朱光潜（详见下表），^⑥其中，除张其昀与张荫麟^⑦之外，谢幼伟与郭斌龢也是浙大教授。

《思想与时代》学社核心社员情况简表

姓名（名号） 生卒	籍贯	教育背景		任职背景		
		国内	国外	教育	学术	政治及其它

^① 《竺可桢全集》第 6 卷·日记，1936 年 3 月 6 日，第 35 页。

^② 在张其昀写给陈训慈的信中云：“竺师前日有一手谕，知浙大已通过成立国文、史地二系，史地系嘱赞兄与弟任之。弟本思自费赴英读书一年，现遵师嘱，延期至明秋。”参见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1936 年 5 月 17 日，收入氏著：《张其昀先生文集》第 21 册·序跋函札类（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573 页。

^③ 关于竺氏为浙大招揽良才，在其日记中多有反映。如 1946 年人类学家吴定良希望任教浙大时，竺氏即为允许：“上午吴均一来谈，渠愿至浙大。余告以浙大并无人类学上之设备，且助教只限一人，教课须每周九小时，渠亦首肯。盖定良自研究院停办人类研究所后大受打击，欲至中大，曾被正之拒绝，此时正所饥而来归。但其造诣，在人类学、统计学上均极可观，不应使之走投无路，故允其至浙大。”参见氏著：《竺可桢全集》第 10 卷·日记，1946 年 7 月 26 日，第 168 页。吴定良此后亦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人类学之意义与范围之文章，还在浙大筹办了人类学研究所。

^④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第二版。

^⑤ 本文主要依据竺可桢在日记中的记载，以及陈训慈的回忆，并对《思想与时代》月刊作者的发文数量做了统计，再佐以当事人谢幼伟和张其昀的说辞，最后厘定学社的七位核心社员为张其昀、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钱穆、贺麟、朱光潜。考证文字将另作他文，此处不赘。

^⑥ 根据对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发表文章数的统计，钱穆、谢幼伟、张其昀均发文 40 篇，排在前三位，张荫麟（16 篇）与贺麟（14 篇）分列其后，郭斌龢（6 篇）与朱光潜（5 篇）列第 10、11 位。这七位核心社员的发文数量已占到刊物总篇数的一半，也标示《思想与时代》月刊乃一同人刊物。

^⑦ 张其昀和张荫麟作为《思想与时代》月刊的主要创议人，笔者已有专文探讨，参见拙稿：《学人、媒介与国家：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为中心》，《史林》2007 年第 1 期。

张其昀 (晓峰) 1901~1985	浙江 鄞县	1919—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史地学部。	1943—1945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及讲学。	1936年11月起任浙江大学教授,史地系主任,1941年出任浙大训导长,1945年任文学院院长。	浙大史地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负责人之一,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 《思想与时代》月刊创议人及后期主编。	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国民参政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一届、二届中央干事及常务干事。
张荫麟 笔名素痴 1905~1942	广东 东莞 石龙镇	1923—1929,清华学堂/大学。	1929—1933,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和社会学,获硕士学位。	1938,西南联大,1940年7月,浙大史地系教授。	《思想与时代》月刊创议人及前期主编。	
谢幼伟 (佐禹) 1905~1976	广东 梅县	东吴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获硕士学位。	1939—1948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	《思想与时代》月刊中期主编。	
郭斌龢 (恰周) 1900~1987	江苏 江阴县	1917,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1922,香港大学,获文学士学位。	1927—1930,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并往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进修半年。	1933,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1937—1946,浙江大学中文系、外文系主任,1946年后任教中央大学。	《思想与时代》月刊中期主编。	
姓名	籍贯	教育背景		任职背景		
(名号)		国内	国外	教育	学术	政治及
生卒						其它

钱穆 (宾四) 1895~1990	江 苏 无锡	江苏常州府 中学堂		1940—1943 成 都齐鲁国学研究 所, 1945 年后在 昆明五华学院任 教。	齐鲁国学研究 所负责人。	三民主义青年 团一届中央评 议员。
贺麟 (自昭) 1902~1992	四 川 金 堂 县	1919—1926, 清华学堂高 等科。	1926—1929, 美 国奥柏林大学、 芝加哥大学、哈 佛大学哲学系, 获哲学硕士。 1930—31, 德国 柏林大学研究。	1938—1946, 西 南联大教授, 1946 年后任北 大教授, 北大训 导处训导长。	1940, 第四届 哲学年会常务 理事, 1941, 中国哲学学会西 洋哲学名著编 译委员会主任 委员。	三民主义青年 团一届中央评 议员, 宪政实 施促进委员会 常务委员。
朱光潜 (孟实) 1897~1986	安 徽 桐城	1917 武昌高 等师范学校 中文系; 1918 —1922, 香港 大学, 教育学 及英国文学。	1925—1929, 英 国爱丁堡大学, 获硕士学位, 1933 年获法国 斯特拉斯堡大 学博士学位。	1933—1937, 北 大西语系教授, 1938 年 底 — 1946, 武汉大学 外文系教授, 教 务长。1946 年后 返北平任北京大 学西语系主任。	《文学杂志》 主编	三民主义青年 团二届中央监 察会常务监 察, 国民党第 六届中央监察 委员会常务委 员。

说明: 为了研究的方便, 各项的时间跨度稍有不同, 包括此前后的情况, 但任职背景及政治项以 1940 年代为主。

资料来源: 王明根主编:《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年版; 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 春秋出版社 1989 年版; 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四分册,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 第 4 辑、第 10 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1987 年版;《中华民国名人传》,《传记文学》(台北)第 47 卷第 3 期;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 1 册,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4 版; 等等。

谢幼伟(1905—1976), 字佐禹, 广东梅县人, 现代著名哲学家。^①纵观谢氏一生, 1940 年代无疑为其学术生涯中成果丰硕的年代。留下了颇为可观的著述, 不仅有专著译著数部,

^① 关于谢幼伟家世及早岁活动的记载已知甚少, 又因其 1949 年后离开大陆, 生平介绍之文字更是难以觅到。只知其早年曾任广州民国日报及华南日报主笔。毕业于东吴大学, 后赴美留学, 入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抗战时期应聘浙江大学执教, 任哲学系主任。1949 年后, 谢氏南渡印尼, 出任天声日报特约撰述与自由报总编辑。至 1953 年到台湾, 担任中央日报主笔; 一度涉入政界, 担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 后落足学术界, 担任政治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和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兼哲学研究所所长。1976 年 10 月病逝于台北。参见谢幼伟:《现代哲学名著述评》,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宋志明撰:“重版引言”。谢幼伟晚年在台湾, “时有论著刊行于世, 每年又指导博硕士论文多篇, 兼哲学论著者与教育学者于一身”。参见王邦雄:《哲人其萎 永怀吾师》,《鹅湖》第 2 卷第 5 期, 1976 年 11 月, 第 2 页。

^① 其作为《思想与时代》学社的主要社员，更为刊物写稿 40 余篇。谢氏引介西方哲人思想，阐释中国固有哲学与文化，奠定了其作为国内重要哲学家的地位。谢幼伟于 1976 年 10 月在台北病逝。在其逝世之后，《鹅湖》杂志刊载了多篇纪念谢氏的文章，并登载谢氏遗著数篇，以示怀念其哲人风采。据谢氏门生林子勋的评价：“谢幼伟先生一生以研究西洋哲学为主，而其中心思想，则在融会中西，以发扬我国的儒学精神，而尤其着重‘孝’的哲学”^②。

就《思想与时代》学社论之，谢幼伟与张荫麟、张其昀、钱穆关系最为密切。1929 年的秋天，谢幼伟与张荫麟相识于由上海开往美国西雅图的轮船上。谢幼伟回忆往事云：“这次的留美学生，约有三百余人，大部分为清华学生，可是其中拟赴美习哲学的，似仅我和张先生二人。这是我们相识的主因。”^③此后，两人虽同在美国，却一东一西，未曾通讯与见面。再次的重逢就在 11 年之后了。1940 年，张荫麟从西南联大转往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与谢幼伟共事于文学院。从此时至张荫麟辞世的两年多中，乃是两人“过从最密，谈话最多的时期”，^④两人还常常碰面商讨办刊之事，这就为谢幼伟加入《思想与时代》学社并成为核心社员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关系。在张荫麟辞世后，谢幼伟亦作悼念文章追念亡友，不仅追溯其为人性格，亦表彰其于史学、哲学等领域的学术贡献。

同样，谢幼伟与张其昀共事于浙大，并分掌哲学系与史地系，过从甚密，自不待言。谢幼伟与钱穆初识于 1943 年，钱穆应邀往浙大作讲学，两人亦相谈甚欢。此三人不独独在 1940 年代结下友情，在以后的岁月中更绵延了这份情谊。

同为《思想与时代》学社核心社员的郭斌龢（1900—1987）^⑤，别号恰周，江苏省江阴县杨舍镇人。6 岁起曾在私塾三年，读过左传、诗经、唐诗三百首等。12 岁毕业于杨舍镇梁丰小学，16 岁毕业于江阴南菁中学。做过杨舍镇范贤小学教员半年。1917 年夏考取南京高师英文专修科，一年后，考取香港大学文科。与朱光潜、高觉敷等为同学。郭斌龢在香港大学曾随英国人奥穆（G. N. Orme）读希腊文三年。郭氏于 1922 年从港大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23 年，郭氏到南京第一中学任教。1925 年春，前往东北大学英文系任教。1927 年夏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哈佛大学，受业于白璧德（Erving Babbitt）门下，主修希腊拉丁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30 年夏至冬，在牛津大学 Balliol 学院进修半年。1931 年春回国，先到东北大学继续任教。“九·一八”事变后，郭氏即到青岛大学，继而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任教。1937 年 8 月，接受浙江大学之聘，曾任浙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浙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等职。1946 年离开浙大，回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9 年后，一直在南京大学任教，直到退休。^⑥关于郭斌龢一生的学问旨趣，其好友缪钺有一概要而精当的

^① 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谢氏著述计有：《伦理学大纲》，正中书局 1941 年版；《辩证法论丛》，独立出版社 1941 年版；《忠之哲学》，商务印书馆 1944 年版；《中国战时学校》，正中出版社 1946 年版；《现代哲学名著述评》，正中书局 1947 年版；《哲理与心理》，正中书局 1948 年版；《论共产主义》（与张其昀合著），华夏图书出版公司 1948 年版。

^② 林子勋：《永怀哲人——悼念谢幼伟教授》，《中外杂志》第 21 卷，第 52 页。

^③ 谢幼伟：《张荫麟》，《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台北）华冈出版部 1971 年初版、1973 年再版，第 385 页。

^④ 谢幼伟：《张荫麟》，《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第 385 页。

^⑤ 长期以为，学界对郭斌龢的研究甚少，究其原因有两点，第一，或因郭氏将精力多投射于译述及教学，故著述相对来说较少。而郭氏的著述至今仍未结集出版，也给研究带来相当的不便。第二，郭斌龢的国民党党员身份使其在 1949 年后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到专案审查。相关研究参见沈卫威：《郭斌龢的文化理念》，《江汉论坛》2006 年 10 月；沈卫威：《中西融通的郭斌龢》，《人物》2002 年第 7 期。

^⑥ 此段经历，主要依据郭斌龢亲自填写的登记表，参见《教育部直属机关学校主要人员登记表·郭斌龢》，1942 年 10 月 24 日，53—1—894，浙江省档案馆藏，第 47—48 页。另参照郭氏于 1982 年撰写的简要自传，这份自传对于 1930 年代之后的经历并无述及。参见氏著：《郭斌龢和简要自传》，收入巴金等著，王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99 页；以及徐祖白：《学贯中西的爱国教授郭斌龢》，收入《张家港人物选录》（《江苏文史资料》第 39 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1 年版），第 105—115 页。

评价：“（恰周先生）精通古希腊、拉丁及英、法诸国语文，深研欧西文哲之学，欲探其流变，撷其精英，而取为我用。归国数十年中，任教上庠，尝思据古希腊文本译柏氏之书以饷中土学者，晚学多暇，始克偿其宿愿”^①。

1923年6月，郭斌稣自香港大学返回，在南京第一中学任教。7月底，奥穆先生访问南京东南大学时与《学衡》主编吴宓相识，9月致函吴宓将其高足郭斌稣介绍给他。郭斌稣由此与吴宓结识，并将《柏拉图会饮篇》及《斐德罗斯篇》从希腊原文译成中文，刊登于《学衡》杂志。^②而此时张其昀也为《学衡》撰稿，两人很有可能已经相识。郭斌稣于1933年应聘至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彼时张其昀亦执教于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两人应有同事之雅。1936年4月，竺可桢即将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之时，邀约张其昀前往浙大任教，张氏应允，并推荐郭斌稣为文学系主任，由此可见两人交谊决非一般。^③郭斌稣在浙江大学文学院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兼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地位相当重要。1938年，陈布雷很想征求国内大学教授和著名科学家参加国民党。陈布雷的第一批目标，“就是张其昀以及张所尊敬或接近的师友。他最先提到的是竺可桢、秉志两师，对张其昀的友人，则提到抗战前夕来浙大任教的郭秉和（即郭斌稣）、及在中大任教的缪凤林诸人。”^④1939年，张其昀与郭斌稣在陈布雷介绍下加入国民党。关于此点，郭斌稣在1949年后写的交代材料中云：“1939年8月（当时我随浙江大学迁至广西宜山），我正式加入国民党为特别党员，介绍人为陈布雷，入党手续是张其昀在重庆代我办理的。”^⑤郭斌稣与张其昀的密切联谊，是其位列《思想与时代》学社核心社员的一个要素。当然，《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宗旨在于“融贯新旧、沟通文质”，而郭斌稣精通欧西文哲之学，文学领域造诣颇深，就其专业及治学志向而言，为刊物负责文学类稿件的组稿及编辑工作较为适宜。与此相较，与郭斌稣地位相当，彼时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梅光迪，亦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攻读西洋文学，且声名更显赫些，却不是《思想与时代》月刊的核心社员。^⑥

1942年10月，《思想与时代》月刊主编张荫麟不幸病逝，究竟何人继作主编，似成问题。作为刊物另一灵魂人物的张其昀，本应担负起主编职责，但其于1943年3月起即准备赴美讲学事宜，5月赴美，实无空暇编辑刊物。据张其昀之意，本想请钱穆来浙大任史地系主任兼为《思想与时代》月刊主编。据竺可桢在1943年2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晓峰偕钱宾四来，钱于十五抵此，本年在校教历史。适晓峰去美国（美国政府催于三月动身），故《思想与时代》事将由钱暂时主编云。”^⑦至3月8日，竺可桢约见钱穆时，钱氏则表示因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事尚未脱离，故4月间必须回成都，继任史地系主任一事则无法速作决定。事实上，钱穆最终未应浙大之聘，就任《思想与时代》月刊主编一事亦未果。

^① 缪钺：《郭斌稣译柏拉图〈理想国〉序言》，收入氏著《冰茧庵序跋辑存》，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82页。

^② 吴宓在1923年9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郭君斌稣偕胡君稷咸，朱君复来访，谈甚恰。并允为《学衡》撰译文稿。《学衡》之事，苟努力进行，必可渐添同志，益增势力。是在人为之耳。”实际上，吴宓对于郭斌稣的印象极好，曾云“郭君人甚高明而诚恳。谈次，极为欢恰，且于《学衡》事亦极热心。”参见《吴宓日记》（2），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8、253页。

^③ 竺可桢在日记中言：“至晚肖堂与晓峰复来，谈及缪赞虞与晓峰均可往浙大，并荐郭秉和为文学系主任。”参见氏著：《竺可桢全集》第6卷·日记，1936年4月12日，第54页。“郭秉和”即为郭斌稣，在竺可桢的日记中这两个名字曾交替出现，但更多时候竺氏称郭斌稣的字，即“恰周”。

^④ 陈训慈言：“其后，张其昀与郭秉和即在是年（1938年）秋末由布雷为之办好特种入党手续。”参见氏著：《先兄畏垒杂忆》，收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3页。

^⑤ 《郭斌稣档案》，南京大学档案馆。转引自沈卫威：《郭斌稣的文化理念》，《江汉论坛》2006年10月，第101页。

^⑥ 尽管梅光迪并不是《思想与时代》学社的核心社员，生前也未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刊发文章，但在梅氏去世以后，《思想与时代》月刊曾出版纪念梅光迪专刊，亦可视为对于梅氏的重视及怀念。参见《梅迪生先生纪念专号》，《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6期，1947年6月。

^⑦ 《竺可桢全集》第8卷·日记，1943年2月19日，第510页。

因《思想与时代》月刊编辑部设在遵义之浙大，则浙大教授兼任此事最为便利，可能性亦较大，而核心社员中除二张之外，即为谢幼伟和郭斌龢。据竺可桢于1943年11月6日的记载：“三民主义青年团自振公离去后，筹备主任迄无人。今日晤谢幼伟，请其担任此事。渠虽勉允，但渠担任《思想与时代》之编辑亦极忙，每月只二万六七千元经费，而印刷最近已需一万四千。印三千本，虽可售去二千余本，但每本只售三元。稿费每千字百元，故维持极难。稿亦不易搜集云云……。”^①如此可见，谢幼伟实际上已担当起《思想与时代》月刊主编之责，不仅要负责搜集稿件，更要考虑刊物的维持与经营。又据陈训慈的回忆，在张其昀赴美讲学之后，《思想与时代》月刊由郭斌龢任主编，^②因此亦不排除谢幼伟与郭斌龢共同负责刊物编辑出版等事宜。由此亦凸显出二人在学社中担当的责任与扮演的角色。

浙江大学作为《思想与时代》月刊及学社存在的地理空间已被确定，但《思想与时代》学社作为一个场域被确立，仍需其他的要素。在这里，场域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特定的要素（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体）都是从其与别的要素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特点”^③。因此，除了浙江大学这一要素之外，学人之间的私谊网络，相同或类似的学术旨趣，都成为构成场域的特定要素，也使这一学社得以进一步拓展。

二 私谊网络、学术旨趣与学社的拓展

在一项关于战前清华知识人的考察中，论者将“清华知识人所处的知识场域分为大小不同层次，最核心的知识场域指知识人所属的研究所（室）、专业学术团体，中层知识场域指清华大学，外层知识场域以北京城为范围。”^④这样一种以地域为中心的知识场域的划分，在一种相对静态与封闭的环境中或许适用，而在一种动态的、被打乱的境遇中如战时中国则另当详论。在特殊的战争时期，学者之间的交往与联系，除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地域空间，其他因素亦应注意。在《思想与时代》学社的核心社员中，钱穆、贺麟、朱光潜三人均不是浙大同人，他们在1940年代服务于不同的大学。那么，他们为何聚首于这一学社呢？

1930年代，钱穆虽在北大任教，但他自己认为，若论个人的见解，则与学衡派较近。钱氏对于彼时中央大学优秀学人多有钦佩，并特别提及缪凤林（赞虞）与张其昀（晓峰），钱氏言：

某年，赞虞远自南京北上，专访余于北平，寄宿余书斋，与余连榻数夜。余偕游北平城郊名胜，曾坐卢沟桥石狮柱上，畅谈逾时。翌年，晓峰亦北上，与余晤面。时赞虞在中央大学任教，而晓峰则移去杭州浙江大学任教。晓峰、赞虞两人意气有不同。晓峰坚不宿余寓，同游机会较少，而畅谈倾怀则与赞虞相仿。^⑤

1937年，张其昀函邀钱穆任教浙大，然钱氏以其他关系不忍离开北大，此为第一次与浙大无缘。尽管未接受张其昀的邀约，却并不妨碍二人之间的情谊。1938年，钱氏居昆明东南的宜良山一寺中专心撰述《国史大纲》，只每周末赴昆明西南联大授课。恰张其昀赴重庆开会，在昆明遇陈寅恪，告知其报纸上载一篇大文章，即钱氏《国史大纲》引论。张其昀为见钱穆一面，远赴宜良，令钱氏尤为感动：“余乃于地板上铺休被，两人连席而卧，作长夜之谈。翌晨，晓峰即匆匆去。宜良距昆明火车半日程，抵车站又有田野八华里，始达岩泉

^① 《竺可桢全集》第8卷·日记，1943年11月6日，第667页。

^② 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录于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5页。

^③ [美]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④ 孙宏云、孙宏英：《学风·场域·知识——关于战前清华知识人的考察》，《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年4月，第7页。

^⑤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原刊《中央日报》副刊，1985年11月11日，后收入氏著：《钱宾四先生全集》5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410页。

下寺。……晓峰远道只身来，浓情蜜意，终生不能忘。”^①或许正是这样一份不能忘怀的友情，将钱穆与《思想与时代》学社紧密相连。1941年，张其昀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向其约稿，钱氏欣然应允，按月撰文。钱氏言：

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写，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者，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其开始转机，则当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此下遂有《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该书后由正中书局出版。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捩一大要点所在，不得谓与晓峰之创办此一杂志无关联。^②

是故，《思想与时代》月刊无疑成为钱穆学术思想一转变之载体，诚如钱氏所言“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时，已专对文化问题上有所发挥。此下乃一转意向，多于文化问题着眼。实于晓峰创为此杂志时启其端，此又感念不已。”^③

钱穆与张其昀在1940年代已成为密友，而钱穆同《思想与时代》学社其他社员的情谊亦十分契合。1931年夏，尚在苏州的钱穆接到北大聘书，遂赴北平，同时亦在清华兼课。在北大的同事中，钱穆与汤用彤关系最为密切，又因汤氏而结识吴宓。钱氏在清华课后常至吴氏寓所品茗倾谈，往来之间对于吴氏的两大弟子“二麟”亦相当熟稔：“贺麟自昭，自欧留学先归，与锡予在北大哲学系同事，与余往还甚稔。荫麟自美留学归较晚，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余赴清华上课，荫麟或先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鸡一只，欢谈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荫麟亲送余至车上而别。”^④钱氏的回忆文字写于半个世纪之后，仍能张荫麟煮鸡等琐事付诸笔端，其间的情谊可谓深矣。

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迁徙，即与汤用彤、贺麟两人同行，至广州时，又通过贺麟，结识了谢幼伟。故此一延续十年的友情，至《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时，已纯然深厚，钱氏欣然为刊物写稿并成为核心社员则属必然。

贺麟加入《思想与时代》学社，应与张荫麟及谢幼伟相关。贺麟与张荫麟的关系颇具渊源，1920年代，二人同为清华学堂同学，尽管贺麟比张荫麟高三级，却因有共同的兴趣与志向，友情相契往来密合。清华毕业后，两人虽同赴美留学，却一西一东，七年未见，只长信联系。1934年元旦，张荫麟回国后即去看望贺麟，此后两人又相聚北平。抗战爆发后，张荫麟因清华待遇问题及家庭变故，最后决计应浙大之聘，前往遵义。张荫麟在临行前向好友贺麟告别，贺麟亦对张荫麟此行抱有信心，相信在张其昀等一班朋友的鼓励协助下，张荫麟终会获得学术上的新成绩。贺麟亦曾提及，在张荫麟去往遵义浙大后，所接到的几封信，均为张荫麟替《思想与时代》月刊索稿之信，^⑤藉两人多年的友谊，张荫麟邀请贺麟加入《思想与时代》学社亦在情理之中。

贺麟与谢幼伟还同为哈佛大学同学，往来亦密。他们在哈佛时，曾受教于英哲怀特海（A. N. Whitehead）门下，并共同前往拜访怀氏。^⑥或因出于政治上的顾虑，贺麟晚年在其回忆中并未提及谢幼伟的名字，但在后人为贺麟撰写的传略中，曾提及当时乃贺麟与同学沈有鼎、

^①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钱宾四先生全集 51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 411 页。

^②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钱宾四先生全集 51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 412 页。

^③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钱宾四先生全集 51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 412 页。

^④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3 年版，第 157-158 页。

^⑤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 20 期，1943 年 3 月，第 15 页。

^⑥ 谢幼伟在怀特海逝世后的纪念文章中曾提及此事：“当怀氏任教哈佛时，始则每星期晚，即则每星期五晚，其查理士河畔之公公寓，常有一二十青年之足迹。若是之集会，作者尝数度参加。”而贺麟亦曾言及于此：“在哈佛大学时，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曾经拜访过一位英国籍的名教授怀特海。他是研究数学、哲学的，是著名的哲学和逻辑学家罗素的老师，也是当时世界公认的懂得相对论的十二人之一。我们谈了许多问题。”参见谢幼伟：《怀黑德之生平与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 53 期，1948 年 11 月，第 2 页；贺麟：《我和胡适的交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 28 辑，北京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5 页。

谢幼伟一同拜访怀氏。^①抗战爆发后，贺麟与谢幼伟虽服务于不同大学，但在学问上多有交流。从贺麟的著述看，贺氏确对《思想与时代》月刊较为熟悉。在他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曾准确地提及谢幼伟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刊发的数篇引介西方伦理观的文章，^②并对朱光潜及郭斌龢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成绩知之也深。^③这些或可成为贺麟同为《思想与时代》学社核心社员的一个佐证。

与此相对应，谢幼伟在回顾抗战七年来中国哲学界取得的成绩时，特别将熊十力《新唯识论》、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及章士钊《逻辑指要》三种著述作详细评介，用意乃“说明中国哲学进步之所在”^④。就贺麟的这部著作而言，谢氏以为虽然并不就是贺麟的代表作（其代表作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却可认为乃中西哲学交流后的最佳作品：“贺先生是想把西洋的正统哲学和中国的正统哲学加以调和的。他所主张或所同情的唯心论不纯是西洋的，也不纯是中国的。他是从这两方面的哲学，体验有得，而自行提出来的。”^⑤从贺麟与谢幼伟对各自著述的评介中，他们共通的学术旨趣昭然若揭，即追求会通的学问，而其中又多少映照出二人惺惺相惜的情谊。

与钱穆和贺麟相比，朱光潜与《思想与时代》学社的关联并不明显。一方面，限于1949年之后的政治环境，朱氏在个人自述中，未曾提及《思想与时代》月刊及学社的任何情况，另一方面，在《朱光潜全集》及各种关于朱氏的传记、研究专著中，于此亦极少涉及。^⑥种种原因造成相关史料相当匮乏。朱光潜为何能够成为《思想与时代》学社核心社员，从他与郭斌龢及钱穆的友情及交往中，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

朱光潜与郭斌龢同为香港大学的同窗。^⑦两人不仅一同进入港大学习，还共同怀念一位对各自学术道路都深具影响的老师：奥穆先生。奥氏时任港府文教司司长，并兼任港大讲师，擅长拉丁文及希腊文学。朱光潜虽然未能坚持和奥穆老师学习希腊文，但对恩师仍相当感念：“由于你的启发，这二十多年来我时常在希腊文艺与哲学中吸取新鲜的源泉来支持生命。我也会学你，想尽我一点微薄的力量，设法使我的学生们珍视精神的价值。”^⑧相比于朱光潜学习希腊文的半途而废，郭斌龢可谓颇具韧性，跟随奥穆老师锲而不舍的认真攻读到底。且在港大毕业之后，奥穆还为郭斌龢介绍了一份中学的教书工作，郭氏则于课闲之时继续随奥穆师学习拉丁文、希腊文，维时一年。^⑨1930年，郭斌龢在牛津大学研究院进修，曾

^① 张祥龙：《贺麟传略》，收入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第61—62页。

^② 论及谢幼伟，贺麟言：“谢幼伟先生除撰有《伦理学大纲》一书，绍述自我实现之说以与儒家思想融会，又曾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发表快乐与人生，自由之真谛，论道德判断，并介绍鲁一士的伦理观，柏烈得莱的伦理观，于排斥功利主义，发挥新黑格尔学派之伦理思想，颇有贡献。”参见氏著《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56页。

^③ 贺麟在论及中国1890年以来五十年中哲学的发展时，认为在最近二三十年内，中国学术上以成功的科学家而贡献到哲学，以成功的哲学系统而推进了科学的事实，异常之少，殊令人惋惜。但文学与哲学却有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并举出朱光潜、郭斌龢等学者为例。参见氏著：《当代中国哲学》，第65页。

^④ 谢幼伟：《抗战七年来的哲学》，收入孙本文等著：《中国战时学术》，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12页。

^⑤ 谢幼伟：《抗战七年来的哲学》，收入孙本文等著：《中国战时学术》，第15页。

^⑥ 曾有论著提及于此，然不确切：“1941年，朱光潜与一批倾向于在传统文化中发掘理想文化因素的学者组成《思想与时代》杂志编委会，这些人包括张其昀、郭斌龢、冯友兰、贺麟、钱穆等。”参见王攸欣著：《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⑦ 1918年，香港大学第一次委托北洋教育部从全国四所高师（北京、南京、武昌、成都）招选二十名师范生，朱光潜报名应试，得69分。名列第八。在港大复试中朱光潜因英语成绩差先入特设的大学先修班，1919年秋再试后，入教育系正式就读。在这二十名学生中，就有后来与朱光潜成为好友的高觉敷、朱跌苍。而郭斌龢亦在其中。参见商金林：《朱光潜先生学术传记》，《文献》，1992年第2期，第125页。另据朱光潜自己回忆：“第一次欧战刚刚完结，教育部在几个高等师范学校里选送了二十名学生到香港大学去学教育，我是其中之一。”参见朱光潜：《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⑧ 朱光潜：《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87页。

^⑨ 郭奉秋：《郭斌龢教授传略》，收入刘蜀永主编：《一枝一叶总关情》（增订版），第68页。

专程前去拜访恩师。^①因为两人共同拥有一位恩师，郭斌龢将有关奥穆师的讯息也传递给朱光潜，老师的境况也令朱光潜感怀不已。

尽管两人自港大毕业后，一直在不同的中学或大学任教，但这样一份同窗情谊却并未中断。1925年夏，朱光潜赴英留学，就读爱丁堡大学。或于此时不久，朱光潜曾写信给郭斌龢。郭氏即作诗一首，题为《寄怀朱孟实光潜爱丁堡》，从此诗中，可读出两人长久的友谊，或许“默契于无言，此意惟君晓”才是他们友情的真实写照。之后郭斌龢亦赴美留学。两人在学成归国后服务于不同的大学，郭斌龢1932年后曾在清华大学任教，但一年后即应聘至中央大学，直至1937年前往浙江大学，抗战后又重回中央大学。而朱光潜1933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时期曾服务于武汉大学。郭氏与朱氏的职业轨迹并未重合，却不妨碍两人于学术上的交流与合作。据后辈学人回忆朱光潜的文章，恰有提到二人之处，所引朱光潜之语似可看出两人情谊之笃厚：“（1934年寒假）我告诉朱先生我很喜欢阅读西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在大学四年级时我曾选修过郭斌和先生给研究生开设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研究。朱先生听了很高兴，他告我他和郭先生是老朋友，他俩是香港大学的同学。……他和郭先生多年未见，听我说我和郭先生经常通信，他让我代他问候。”^②

朱光潜加入《思想与时代》学社，并成为核心社员之一，或许就得力于郭斌龢的邀请。当然，朱光潜对于中国固有文化的认同与体味，亦是其根本原因之一。但当时对中国文化抱有相同态度的学人不在少数，为何独朱氏成为核心社员，私谊网络与共同的学术旨趣仍为关键。

在《思想与时代》学社核心社员中，朱光潜与钱穆的关系不仅密切且绵延长久。1941年3月，钱穆应嘉定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之邀往武大短期讲学，当时住所恰与朱光潜为邻。钱氏云：“时孟实一人独处，余中晚两餐，皆去其寓与孟实同餐。畅谈甚相得。”^③时隔42年之后，两位老友再次重逢。1983年3月，朱光潜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金耀基院长之邀请，决定赴港参加第五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并作美学专题讲演。而朱光潜与金耀基的沟通则在一年前展开。据朱光潜致金耀基书信云：

今春接大函，承邀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席，考虑到年老力衰，怕不胜远道跋涉和应酬之劳，故迟迟未复。入夏以来，贱体似在好转，想到宾四先生系多年挚友，又觉义不容辞。近几年在研究翻译维柯《新科学》，想以“从维柯《新科学》看我国古代社会文化”为题作一论文作为演讲底稿，不知是否合适，望便中示。^④

从此信中可窥得朱光潜颇为惦念老友钱穆，学术交流固然为一个方面，而与老友重逢更令朱氏向往。彼时的一则新闻报道为我们展现了当时会面的一个场景：“当朱光潜演讲完毕，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教授请钱穆先生上台，同朱光潜一起，与听众见面，顿时掌声四起。两位先生并肩而立，互相问好，一起照相。台下一千多年轻学生深为这个场面感动。他们赞叹两位老学人的深情厚谊。”^⑤

朱光潜与郭斌龢及钱穆的友谊，及其对于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以及他在1940年代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认同，^⑥均可视为其加入《思想与时代》月刊核心社员的几个要素。

^① 据郭斌龢的学生回忆：“奥氏被郭氏比作为鲁迅的藤野先生。‘虽然他的姓名鲜为人知，但是他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写在1981年日记扉页。）后来在1981年7月接到香港来信，获知‘沃姆师、师母均已作古’，（郭氏）甚为悲恸。”参见章学清：《学贯中西、文通今古的郭斌龢先生》，中央大学校友会编：《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第75—83页。

^② 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黄河》1994年第1期，第142页。

^③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7页。

^④ 朱光潜：《致金耀基》，1982年，收入氏著《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643页。

^⑤ “朱光潜钱穆喜重逢”（报道），《文汇报》（香港），1983年3月27日，转引自《文教资料》（双月刊），1986年第3期，第15页。

^⑥ 朱光潜在1940年代曾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监察会常务监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常

三 怀念亡友、学术建设与学社的延续

《思想与时代》学社同人或因共为浙大同人，或因密切的私谊网络，或因相同或类似的学术旨趣，形成一个往来较为密切的学人群体。然而，身处战争纷扰的1940年代，学人间的跨地域交往实非易事，故以学人刊物为媒介，志趣相投的友人借此发表己见，潜心问学，实现自身于思想建设的抱负及理想，成为彼时代学人交往的一种途径。可以发现，《思想与时代》学社以其特有的方式延续这一学人群的聚合，并积极拓展学社的影响力。

《思想与时代》学社同人对于主编张荫麟的怀念是为延续这一聚合的重要方式。作为刊物前16期的主編，张荫麟对于《思想与时代》学社贡献特大。张其昀言：“《思想与时代》月刊尚在创办时期，他（张荫麟）实际负起掌持文衡的责任，于甄选稿件不辞劳怨，以期树立本刊严格之标准。将来本刊对时代思潮果能稍有贡献，我们永远忘不了这位最可敬爱的创议人。”^①贺麟对于张荫麟前往浙大开创的新事业多有鼓励：“我那时深信他去到浙大，有晓峰兄他们一班朋友的切磋鼓励，又无室家之累，他必能发愤著述，移其爱女子之真忱，以鞠躬尽瘁于学术，而开创一种新途径。及《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刊行，他也异常感兴味，果然向着大家所期望于他的方面进展，我颇觉欣慰。”^②谢幼伟对于张荫麟的主编工作亦多褒扬，所忆甚详：“当《思想与时代》月刊初出版的时候，他来约作者写文章，可是作者却非常害怕。怕的是文章到他手里，不见得可以通得过。所以作者的文章写好之后，首先就送给他看。只要他点了头，没有话说，作者才放心。在许多好友和同事中，作者或许是最侥幸的一个，文章没有受到他过分严峻的批评。有不少同事的文章，不惟给他批评得体无完肤，且坚决主张不登。他因此得罪了不少好友和同事。虽然有人说他偏见过重，可是现在看来，要刊物的水准提高，他这样人是缺少不得的。”^③或许正是张荫麟的这份认真与严谨，才使《思想与时代》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

然而，张荫麟不幸于1942年10月24日因肾脏病辞世，时隔三月，为纪念亡友张荫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即特辟一期纪念专刊《张荫麟先生纪念号》^④，在数篇来稿中拣选8篇文章，此8篇文字中，除王焕镛的传记、徐规整理的张荫麟著作目录、及陈梦家为张荫麟《中国史纲》所写的多有褒奖之意的书评外，其余均为《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的纪念文字，^⑤而在第20期上，又刊登了贺麟的纪念文章《我所认识的荫麟》，亦显现出同人纪念意义。在张荫麟逝世之后，其夫人（已离异）伦慧珠女士将张荫麟所遗留的书籍赠与浙大史地学系，为此，《思想与时代》学社同人在纪念专号上登发一则启事云：“本社为纪念已故张荫麟先生特开东莞室，搜藏典籍图志期刊报告之类。”^⑥此期刊物的所有稿费3000元亦捐赠张荫麟家属赡养基金保管委员会作为其家属赡养费用。4年之后，1946年4月，尚在遵义的浙大欲迁回杭州，校长竺可桢与文学院张其昀、黄尊生及李絜非几人，再往张荫麟的墓前祭扫。竺氏云：“其墓前只有一石碑而四周无石磴，故与晓峰谈，决出资修理以护土。”^⑦时

务委员等职，参见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655、669、670页。

^①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第2版。

^②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0期，1943年3月，第15页。

^③ 谢幼伟：《张荫麟先生言行录》，初刊于《东南日报》（杭州），后收入伦伟良编：《张荫麟文集·序言》，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版，第5—6页。

^④ 在此期刊物最后，有一则编者启事云：“张荫麟先生歿后，承其生平知交远道寄文悼念，现已收到冯友兰、萧一山、贺昌群、吴晗、容肇祖、张君川、丁则良、徐规、管佩韦诸先生文字，本刊因限于篇幅，不克于本期刊出，殊以为谦。以上悼文及挽诗挽联墓志铭祭文等，将另印增刊，（由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刊印），俟出版后再行公告。”参见《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1943年1月。

^⑤ 计有张荫麟遗著《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谢幼伟：《张荫麟先生之哲学》；熊十力：《哲学与史学》；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

^⑥ “《思想与时代》社东莞室征求图书启事”，《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1943年1月。

^⑦ 《竺可桢全集》第10卷·日记，1946年4月5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张荫麟尚遗有书籍两屋，张其昀意欲史地系研究室出 40 万元购置，其中拨 10 万元修墓，竺氏亦允之。可见，对于张荫麟，这一学人群的确非常怀念。

有关张荫麟善后之事的处理，及其遗稿的整理，都有《思想与时代》学社同人及浙大史地系师生在做。^①在张荫麟逝世 4 年后，好友吴晗在一篇纪念文字中言：“在他死后的一个月，我曾经写信给浙大张其昀先生，表示愿意替荫麟整理并出版遗作。张先生回信说，这些事浙大都在做，无需重复了。不久之后，张先生去美讲学；隔了两年，张先生回国，荫麟的著作似乎毫无消息，到至今还是如此。”^②从吴晗的文字中，多少透露出些许不满与遗憾；而张其昀的回复则明确告知吴氏，整理张荫麟遗稿之事乃“我们同人”的职责，无须他人插手。这一同人的分界是相当明晰的。

事实上，张荫麟的遗著确由浙大同人，主要是谢幼伟代为整理，张荫麟的史学理论著作曾编为《通史原理》，其关于宋史遗文编为《宋史论丛》，但因彼时所处战乱之时，出版之事极为不易，故均未出版。实际上，编纂国史丛书一直是张荫麟与张其昀创办《思想与时代》学社的初衷之一，而在战时中国，编纂国史长编决非易事，至少在张荫麟生前，此计划一直未能展开。在张荫麟过世后，张其昀在其追悼会上的致辞中云，将张荫麟在病中修改的《中国史纲》列入思想与时代“国史丛书”第一种，拟在赣南印行。此外，张其昀为达成张荫麟生前之遗愿，即“以学社为中心，刊印国史丛书”，曾言：“《思想与时代》学社兹决定于三十一年度开始编印此丛书，预定一百种，期于二十年内完成之，每年约出书五种，以实践其遗志”^③。尽管后来因种种原由，编纂国史长编的计划未能展开实施，然其所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月刊则延续 8 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二张及其同人的理想，展现了战时国内学界谋思想建设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编纂国史丛书的志愿，张其昀从未放弃，并在其晚年得以实现：“来台以后，我主编中国丛书，十年以来，已出版三百种，大都与国史有关，可算实现了当年的志愿，以后自当继续编印”^④。

1949 年后，大陆学界似乎已将这样一位天才的史学家所遗忘，张荫麟的文集最先由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于 1956 年出版发行。^⑤这部文集的出版亦可看作张其昀为纪念好友张荫麟而为。^⑥1971 年，为纪念“中华民国”成立 60 周年，张其昀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一书序言中写道“特敦请本院（指中华学术院）各分科协会会员卅九人，各就民国时代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已去世之伟大学者，撰述纪念论文一篇，于其生平行谊、学术思想、著述要旨及其对后来之影响，合计共四十篇”^⑦，其中就包括谢幼伟撰写的张荫麟纪念论文。谢幼伟高度评价张荫麟短暂却富有意义的一

^① 除浙大同人所做的悼念活动外，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诸友亦曾召开追悼会，吴晗、贺麟、冯友兰等友人曾筹款在清华大学设立张荫麟纪念奖学金，后因货币贬值过速未果。参见《吴宓日记》（8），1942 年 12 月 4 日，第 420 页；吴晗：《记张荫麟》，《大公报》（天津），1946 年 12 月 13 日；又见氏著：《史事与人物》，生活书店 1948 年版，第 81 页。

^② 吴晗：《记张荫麟》，《大公报》（天津），1946 年 12 月 13 日；又见氏著：《史事与人物》，第 78 页。

^③ 张其昀：《张荫麟先生追悼会致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 18 期，1943 年 1 月，第 28 页。

^④ 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 第一册 远古史·自序》，第 4 页。

^⑤ 1954 年 7 月，张其昀出任台湾“教育部长”，在其任期内，积极谋求台湾学术、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发展。在文化方面，“又设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医药研究所、美育委员会、国剧改良委员会、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等机构与组织，以筹谋中国文化之发扬。如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之下，出版英文本中国文化季刊；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之下出版中华丛书等多种。”参见宋晔：《张其昀》，《中华民国名人传》第 3 册，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3 页。

^⑥ 关于张荫麟的文集，已出版三种：伦伟良编：《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 1956 年版；李毓澍编：《张荫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 1977 年版。关于此两种文集的编辑得失，黎华赵曾有专文详述，值得参考。参见黎华赵：《论伦伟良〈张荫麟文集〉与李毓澍〈张荫麟先生文集〉之编辑得失》，《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附录（一），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 年，未刊稿，第 405—412 页。另有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⑦ 张其昀：《序言》，中华学术院编：《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编辑例言。

生,认为“他的文章,他的学问,他的品格,他的天才,都对中国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还特别提到张荫麟与《思想与时代》的关系:“据作者所知,张荫麟先生就是基本撰述人之一。他择稿极严,甚至另一位基本撰述人的文章,都曾为他否决过。《思想与时代》月刊之所以维持其高度的学术水准,荫麟先生之功是不可没的。故如吾人承认《思想与时代》月刊对中国文化有贡献时,自也不能不承认荫麟先生对中国文化亦有贡献了。”^①应当说,张荫麟的史学天才及哲学思辨,在民国学界确为罕见。但张氏年仅37岁即告辞世,生前出版的著作仅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史纲》,倘若没有张其昀、谢幼伟等一班朋友在其身后搜集遗稿、编纂文集、撰文纪念,又有谁能保证这样一位天才的史学家不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呢?

不仅如此,张其昀在去台后对张荫麟的遗孀遗孤仍有所照顾,据张荫麟的学生回忆:“1957年,张先生任‘教育部长’时,特接伦女士携男女公子至台暂住,男公子匡与女公子华,在政治大学完成学业以后,即去海外谋发展,今已各有成就,荫麟师地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②从对张荫麟遗作的整理直至其身后文集的出版,以及张其昀念念不忘的“国史丛书”,均可展现《思想与时代》学社的学术抱负与紧密私谊。

《思想与时代》月刊作为1940年代重要的学人刊物,对于学术多有贡献。除了每期均刊发学社核心社员的著述外,《思想与时代》月刊亦刊登不少重要学者的文章。冯友兰的《新原人》一书各篇最早即刊发于此。^③于刊物本身之外,《思想与时代》学社还积极谋求拓展学术空间,通过贺麟与谢幼伟在中西哲学编译委员会从事的工作,以及张其昀谋求社员团聚的举措,可窥见一斑。

1941年,中国哲学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在昆明成立,贺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此一编译委员会的成立,实乃贺麟向蒋介石建议且由政府资助而成立。^④事实上,这一编译委员会成立后,确实对于中国哲学多有贡献。1945年,谢幼伟在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哲学发展时特别提到于此:

两年前中国哲学学会组织了一个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由贺麟先生主持。目的是在系统的翻译介绍西洋正统哲学的名著。所译的书都是经过选择的。所请的译者,则不惟是哲学专家,且是该一类的专家。译者每译一书,都得写一篇长序来说明是书得内容。译言有难解之处,还须加以注释或按语。译成之后,且须经过另一哲学专家得校阅,才能出版。其工作的程序,是非常钦慎的。^⑤

对于该编译会的作用,谢氏亦云:“作者不敢说,由该会译出来的书便一定好,然这是有计划,有系统的译书工作,也是合乎理想的译书工作。作者深信这种工作继续下去,将来是一定会发生莫大之影响的。这岂不是抗战七年来中国哲学界的一种好现象吗?”^⑥谢幼伟

^① 谢幼伟:《张荫麟》,收入中华学术院编:《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第386页。

^② 张效乾:《怀念张荫麟先生》,《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年7月,第116页。

^③ 《思想与时代》月刊从第6期开始连续刊登冯友兰的文章,直至第15期,共10篇。有意思的是,冯友兰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刊发的最后一篇文章乃《论死生》(1942年10月),1942年11月冯氏作有《论命运》即刊于昆明《中央日报·星期评论》,之后冯氏的著述亦不再刊于《思想与时代》月刊。诚然,著述刊于何处,会有种种可能与偶然,但冯氏著述刊于《思想与时代》月刊则彰显了主编张荫麟(主编刊物前16期)与冯友兰的密切情谊。早在1920、1930年代,张荫麟即对冯氏著述给予学理上的批评,出发点则是善意的,与人为善的。是故,“他同贺麟、冯友兰等人争辩得尤其厉害,结果他们却成为最好的朋友”。参见李洪岩:《论张荫麟及其“新史学”》,《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18页。

^④ 周辅成在回忆贺氏的文章中曾云:“当蒋介石问他(贺麟)需要作什么的时候,他只说要一点钱办一个编译委员会,学严几道介绍西方正宗哲学于中国”参见周辅成:《哲学、文化与民族——我所了解的贺麟先生》,收入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2页。此外,周氏在此文中亦对此编译委员会多有肯定:“这个编译会,确实作了一些好事,团结了不少学人,尤其是培养了不少青年学者。”

^⑤ 谢幼伟:《抗战七年来的哲学》,收入孙本文等著:《中国战时学术》(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化运动丛书第八种),天地出版社、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18页。

^⑥ 谢幼伟:《抗战七年来的哲学》,收入孙本文等著:《中国战时学术》,第17—18页。关于此编译会,贺麟

对于编译会的高度评价，不仅因为此乃友人主持的机构，更因其自身亦参与其中。事实上，此一编译委员会首先出版的两部译著即为贺麟所译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致知篇》，及谢幼伟所译鲁一士（Josiah Royce）《忠之哲学》。且谢幼伟所译此书亦是在贺麟的鼓励下得以完成的：“鲁一士这部《忠之哲学》，我在民国二十五年春季，就打算把它译出。当时曾译了四五千字，即以事停止。到去年秋季，友人贺自昭（麟）兄，提议要我翻译这书，才继续在八个月的时间内，把这书译成。”^①从这样一部译作的翻译到出版，贺麟与谢幼伟之间不仅私谊密切，且在学术上能互相提携。

而且，从谢幼伟翻译此部著作的过程中，亦可窥见其与《思想与时代》学社诸位同人在学术上展开的切磋：“这书每译一章，均经张荫麟兄读过，贺自昭兄亦曾校阅一遍。他们均有不少指示。译者曾根据他们的指示，改正多处，苟尚有错误，仍有译者负责。所以这两位是译者要特别感谢的。其次要感谢的是郭恰周（斌猷）兄。译者在英文方面，曾请教过好几次。”^②由是看出，《思想与时代》学社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同人发表言论的平台，它还将志趣相投的学者紧密相联，于刊物本身之外，亦多学术上的交流。持共同旨趣的学人，因私谊较为密切，也就更易联合起来拓展学术空间。

除译述活动外，《思想与时代》学社还以丛刊的形式积极拓展影响力。1948年，正中书局出版发行了五种《思想与时代》丛刊，分别是贺麟等著《儒家思想新论》、张其昀等著《现代思潮新论》、谢幼伟等著《哲理与心理》、竺可桢等著《科学概论新篇》、朱光潜等著《政治与教育》。每一种一个主旨，选编十篇左右的文章成书。所选择的内容均是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已刊登的文章。从这五种丛刊中，亦得以窥见《思想与时代》月刊主编最为重视的思想主旨以及刊物欲亦阐扬的内容。勿庸置疑，儒家思想、现代思潮、哲学、科学、教育、政治等均为丛刊的主要意旨，也是学社欲以从事思想建设的主要领域。此丛刊的出版发行，或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于1941年，且在遵义出版。当时仍处于抗战时期，且遵义地处西南一隅，交通亦不便利。故时间与地点都影响了《思想与时代》月刊进一步拓展其影响力。二是刊物当时登载的内容相当纷繁，涉及到思想文化、科学新知及政治言说等各个层面。且刊物一般按照时间的顺序出版，不曾将各类主旨综合一处。此丛刊的出版，或可弥补这一缺憾。

学术建设之外，人事上的聚首也是《思想与时代》学社积极努力的方向。1943年初张其昀有请贺麟来浙大任教的打算，但因彼时浙大哲学系已有哲学教授石泉与谢幼伟二人，故只能作罢。^③不过通过此事，仍可看出围绕《思想与时代》学社，其核心社员已成为联系较为密切的一个群体。

1943年2月，钱穆曾南游遵义浙大，讲学一月，“其时晓峰为浙大遍觅国内名学者，如缪彦威、郭斌猷、谢幼伟等诸人，皆在浙大文学院任教，与余皆一见如故，相聚畅谈，诚为当时避难后方难得一快事。”^④而此时钱穆亦有留在浙大任教的机会。3月8日，浙大校长竺可桢约见钱氏，望其下半年能留在浙大继张其昀任史地系主任（张氏此时要赴美访学一年），

自己亦曾论及：“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参见氏著：《当代中国哲学》，第27页。

^① 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编，鲁一士（Josiah Royce）著，谢幼伟译：《忠之哲学·译序》，（赣）商务印书馆印行1944年版，第1页。

^② 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编，鲁一士（Josiah Royce）著，谢幼伟译：《忠之哲学·译序》，第1页。

^③ 《竺可桢全集》第8卷·日记，1943年2月28日，第516页。

^④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钱宾四先生全集 51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411页。另据钱氏在《师友杂忆》中云：“余来浙大，晓峰外，谢幼伟已先识，郭斌猷缪彦威乃新交。余常与彼等四人往来，相谈甚欢”。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244页。

但钱氏以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主任事尚未脱离，4月间须回成都而婉拒。^①

1945年12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病逝，竺可桢与张其昀商议之后，决定任命张其昀为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对文学院的前景与发展甚为关注，1946年1月，张氏在写给好友陈训慈的信中言：“弟愿能添设哲学、新闻二系，哲学因昔日委座曾有一电，注重哲学，大致可望先行成立。贺自昭兄为能来与幼伟兄合作，再有宾四，授中国古代思想，则阵容颇强，日内拟函征同意。”^②张其昀的这一设想，是希望将贺麟与钱穆招揽至浙江大学文学院。与此信仅隔一日，张其昀即将此愿望诉之校长竺可桢。竺氏在日记中言：“晓峰欲聘钱宾四、贺麟，余均赞同。但同时告以钱宾四往往藐视同辈，如到浙大，亦不能给以特别待遇。”^③竺可桢对于钱穆的这种不佳印象，大概与前次钱氏拒绝浙大事有关。但并不妨碍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学社的地位，亦可见张其昀极力谋求《思想与时代》学社核心社员团聚的良苦用心。

由于各种原因，这种谋求人事聚合的愿望并未能实现，贺麟此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钱穆则先在云南大学，后往家乡的江南大学，均未久留。然而，这一谋求聚合的愿望，竟成为1950年代香港新亚书院创办的源头之一。

1949年春夏，钱穆与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前往广州。一日在街头忽遇张其昀。张其昀告知钱穆，拟去香港办一学校，邀请钱穆加入。钱穆答曰：“自一九三七年秋起，屡荷浙大之邀，仅赴遵义作一短期停留，有负盛情，每以为憾。此次来广州，本无先定计划，决当追随，可即以今日一言为定。”^④除了钱穆，张其昀亦邀约谢幼伟、崔书琴等好友，相约共往香港办学。但后来张其昀接到蒋介石的电邀而往台湾出任党政要职；谢幼伟不久后亦前往印尼出任报馆主笔。^⑤动荡的时局中，个人有个人的特殊。新亚书院最终由钱穆负责创办。三人虽未能聚集一起在香港兴学，但曾经短暂的相聚亦可看出三人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钱穆为新亚书院付出了16年的心血，对于一名学者而言，殊为不易。钱穆的名字与新亚书院紧密相连，而在新亚的背后，则又有张其昀的支持。1985年，张其昀逝世。在悼念老友的长文中，91岁的钱穆回忆了新亚往事：

人皆谓余创办此校，实则幕后真创此校者乃晓峰，而非余。尤可异者，余自三十九年冬来台北，此后几乎每年必到。到则必晤晓峰。晓峰任教育部长，部内各项学术专门会议余亦多参预。晓峰犹必与余郊外同游，远近诸名胜，几皆遍历。两人同坐一汽车，必得长逾半日之畅谈。凡新亚事，有所请托，晓峰无不允，尽力为之。但晓峰从不与余提及新亚事。此学校之创办，晓峰岂不知。其推余为校长，晓峰亦岂不知。而晓峰乃置身事外，绝不问闻，一若此校与彼绝无关系。在晓峰意，似因未克身赴香港，亲预其事，乃于此校现况与其前途开展之理想，绝不过问，以免作局外之干预。此种朋友相交之一番深情厚意，乃有达于一种难于以口舌阐申之境界。^⑥

1960年代，张其昀在台湾创办中国文化学院（后改名为中国文化大学），谢幼伟曾予以协助建设哲学系。据谢氏门生林子勋回忆谢氏晚年学术生涯言：“余犹忆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之初，首设哲学系，张创办人晓峰先生，特邀幼伟先生出任该系主任，先生欣然应允，筹办

^① 《竺可桢全集》第8卷·日记，1943年3月8日，第521页；此外，据陶飞亚关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研究，亦对此阶段钱穆的工作有所交待：“1941年下半年起顾（指顾劭刚）离成都赴重庆，指导学术研究，但仍以部分时间在国学所工作。1942年4月辞去在齐鲁大学的任职，主持中国历史学会的‘中国历史研究计划’，钱穆接任国学所主任。”参见氏著：《哈佛燕京学社与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收入氏著：《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② 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1946年1月11日，收入氏著《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序跋函札类（二），第11575页。

^③ 《竺可桢全集》第10卷·日记，1946年1月11日，第11页。

^④ 钱穆：《新亚书院创办简史》，《新亚遗铎》，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54页。

^⑤ 钱穆：《新亚书院创办简史》，《新亚遗铎》，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53—755页。

^⑥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14页。

不遗余力。后因以香港新亚书院钱院长宾四之聘，远离台岛。而文化学院哲学系主任一职，亦不获辞，且由其介聘专任教授代理。此固因先生与张创办人的深厚友谊，而亦其志切哲学教育的热心所致。”^①从这段经历，可看出谢幼伟、张其昀、钱穆三人之间的亲密友谊。1965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院长一职，后离开香港，晚年定居于台北。在台北时，即接受张其昀的邀约，在中国文化学院任教。可谓终于圆了两人当年的愿望。

四 结语

《思想与时代》学社的核心社员在1949年后以去留大陆为界，分为两拨。郭斌龢、贺麟、朱光潜留在大陆。由于《思想与时代》月刊与国民党政权的关联，迫使此三人对于刊物及学社一事均保持缄默，无从提及，也使得这段往事渐渐淹没于历史之中。而张其昀、谢幼伟、钱穆对于亡友张荫麟的纪念，及诸人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再次聚首，则多少彰显了这一学社的生命力。

1936年，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并将张其昀、郭斌龢等学人揽至浙大，确定了《思想与时代》学社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置。张其昀与张荫麟在浙大的会合及共同的学术抱负，使学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创建。藉着紧密的私谊网络与共同的学术旨趣，1940年代散居于成都昆明乐山诸地的钱穆、贺麟、朱光潜的加盟，使学社得以壮大。由此，学社不仅出版编辑《思想与时代》月刊，更开展学术活动、出版丛刊、谋求人事团聚，种种努力使《思想与时代》学社成为1940年代中国学界一个联谊密切的学人群体。

通过细考这一学社创始、聚合及延续的历史，这一学人群更多的还是显现出了作为学界“自组织”的力量。在1940年代的中国，学界“自组织”的涵义更多地是指学人谋求团聚及拓展学术的一种自发的有序活动，外界干扰（诸如国家权力）无法主导并控制学人“自组织”。本文从内部视角进入，对于《思想与时代》学社聚合过程所展开的历史探究，表明学社作为自组织经历了从相对较低到相对较高的发展，其功能也逐渐从简单向复杂衍生。与以往学界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外部因素及政治影响不同，探究其内部的聚合过程，不仅可以厘清作为学界“自组织”的《思想与时代》学社从自发联合到自觉拓展延续的有序过程，而且展现了学人在战时及战后中国谋求思想建设和拓展学术空间的种种路径，同时揭橥中国思想界的多重面相。诚然，随着《思想与时代》学社场域的形成，其对外控制有价值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活动势必展开。

（责任编辑：沈洁）

^① 林子勋：《永怀哲人——悼念谢幼伟教授》，《中外杂志》第21卷，1977年第1期，第48—49页。